

# 从误译看译者主体性的体现 ——以亚瑟·韦利英译本《论语》为例

高晓仙<sup>1</sup>, 赵国月<sup>2</sup>

(1. 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甘肃兰州 730070 2. 长江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重庆 408100)

**【摘要】**《论语》是中国典籍著作之一, 其特殊语言和名言警句对后世文学创作以及中国社会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通过分析译者主体性在韦利英译本《论语》中误译上的体现, 得出翻译成败的关键就是看译者主体性能否正确发挥。译者不仅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去了解文化、把握原作者意图, 还要考虑到限制译者主体性发挥的主客观因素, 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尽可能避免误译, 充分再现原文以达到交际的目的。

**【关键词】**译者主体性; 《论语》; 误译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724 (2012) 03-0048-05

## An Analysis on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from Perspective of Mistranslation

GAO Xiao-xian<sup>1</sup>, ZHAO Guo-yue<sup>2</sup>

(1.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Gansu,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Yangtze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8100, China)

**Abstract:** As one of the Chinese classics, the special language and wisdom words in The Analects produce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literature and Chinese social culture in later ages. After analyzing the reflection of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on the mistranslation in Waley's English version of The Analects, the present study comes to a conclusion that the key to translate classics successfully depends upon the proper playing of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Translator not only completely gives full play of his activeness to understand the culture and grasp the writer's intention, but also considers the objective factors and subjective factors which restrict the play of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After all, the translator should completely reproduce the source text in target language through considering these two aspects together.

**Key Words:**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The Analects; Mistranslation

### 1、引言

翻译是跨文化交际的首要途径, 正如许钧<sup>[1][3][69]</sup>所说: “翻译, 是文化的媒人, 起着不同文化交流的中介作用,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桥梁作用’”, 如何做好翻译以达到文化传播之目的成为当今翻译界的热门话题之一。

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作品蕴含的哲学思想和价值观念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髓, 而这些精髓向外传播主要取决于典籍作品的翻译, 因此典籍翻译的质量好坏直接关系到

中国本土文化是否顺利对外传播。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的《论语》是中国儒家经典之一, 也是中国群众思想和传统文化的结晶。《论语》语言简洁精炼、含义深刻, 其中有许多言论至今仍被世人视为至理。《论语》的外译经久不衰, 最早的英译见于传教士马希曼 (Joshua Marshman) 的节译本 The Works of Confucius (1809)。第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译本是英国著名汉学家理雅各 (James Legge) 的 Confucian Analects, 被收入 1861 年出版的《中国经典》第

**【收稿日期】** 2012-08-01

**【作者简介】** 高晓仙, 女; 西北师范大学,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翻译学。赵国月, 女; 长江师范学院, 助教,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翻译学、英语教学。

一卷。此后，翻译过《论语》的西方学者先后有埃兹拉·庞德 (Ezra Pound 1951)、翟林奈 (Lionel Giles 1943) 等二十余人，中国学者有辜鸿铭 (1898)、许渊冲 (2005) 等。在中国典籍向外传播的过程中，蕴含的本土文化因为翻译而流失或被扭曲，不被外国人所理解，这严重阻碍了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本文参照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和李泽厚的《论语今读》，对比分析亚瑟·韦利的英译《论语》，从译者主体性角度探究其英译本的误译原因，并以此为契机探索典籍英译策略，进一步推动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

## 2、译者主体性及误读的概念界定

20 世纪 70 年代，翻译研究出现的“文化转向”，形成了面向译入语文化的文化学派翻译理论，译者的文化身份及其主体性问题被纳入研究视野，其中译者主体尤为各研究者所热衷。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译者主体性包括三方面内容：译者选择翻译内容、翻译文化和翻译策略所依赖的“目的性”；译者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制约主观能动性的主客观因素的“受动性”<sup>[6] 22</sup>。

不同民族由于地理、人文环境、思维方式、审美情趣、认知结构等方面不同，对外界事物的情感和概念难免会产生误差而影响译文内容。这种误差首先体现为误读，误读是指对文学作品另有所解，是指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在一定时期内不能穷尽其文本内涵和审美价值的解读现象<sup>[10] 8-14</sup>。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误读会转化成误译，由于一种语言无法诠释另一种语言的涵义、文化等，使目的语读者误解原语内涵和文化。本文通过分析《论语》英译本上的误译现象，透过现象看本质，寻找由于误译而导致阻碍文化传播的根本原因，从而对典籍翻译中如何避免误译进行建设性的思考。

## 3、韦利《论语》英译本中误译及译者主体性

不同时代的译本读者对同一译本的理解、鉴赏会有很大差异，即使是同时代同环境下的读者，由于他们的文化教养、生活经历和审美情趣等方面的不同，对同一作品的理解与鉴赏也会千差万别。在解读或翻译某个文本时不可避免误读的产生和意义的不断生成<sup>[10] 8-14</sup>。这种误读和误译又是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综合分析后，Nord<sup>[11] 75</sup>将误译分为语用误译、文化误译、语言误译和文本类型误译四种类型。因本文只选择亚瑟·韦利的英译《论语》文本作为研究对象，所以舍弃误译的第四个类型，即文本类型误译，仅从前三个方面，即语用误译、文化误译、语言误译来探究亚瑟·韦利《论语》英译本中出现的误译。

### 3.1 语用误译

Nord<sup>[11]</sup>认为，语用误译是由于面对语用翻译问题时解决不充分引起的，即如若译者对于原作者的意图理解

错误或忽略语境，就会导致误译。这些语用误译主要体现在语言本身以外的因素上，最主要的是语言使用层面上，比如信息发出者的意图、接受者的理解和解释、时间空间不同以及语言使用者的动机目的不同，现举例说明。

例 1：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18》）

李泽厚今译（以下简称“李译”）：孔子说：“质朴超过文采就粗野，文采超过质朴就死板。文采和质朴结合匀称，才是君子。”<sup>[9] 189</sup>

杨伯峻今译（以下简称“杨译”）：孔子说：“朴实多于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多于朴实，又未免虚浮。文采和朴实，配合适当，这才是个君子。”<sup>[14] 68</sup>

韦利英译（以下简称“韦译”）：The Master said, “Natural substance prevails over ornamentation, you get the boorishness of the rustic. When ornamentation prevails over natural substance, you get the pedantry of the scribe. Only when ornament and substance are duly blended do you get the true gentleman.”<sup>[3] 59</sup>

李和杨注释句中的“文”皆指各种礼节仪文，而韦利采用直译，将“文采”译为“ornamentation”，即“装饰”，两者不仅意义差别很大，指代内容也不尽相同。韦利本意在展现原作原貌，如他所说：“...there is room for a version such as mine, which attempts to tell the European reader what it meant to those who compiled it”<sup>[4] 76</sup>。他在译文中选用“ornamentation”对应“natural substance”，目的是让西方读者更能直观地感受东方文化，反而却忽略了原句中“文”的所指，忽略了“文”与“君子”的关系和其语境。“文”在这里应指“君子”为人处世的礼节仪文，韦利没有把握好词与语境的关系，导致了误译。再如：

例 2：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颜渊·20》）

李译：子张问知识分子如何才可以做到“达”？<sup>[9] 366</sup>

杨译：子张问：“读书人要怎样做才可以叫达了？”<sup>[14] 146</sup>

韦译：Zizhang asked what a knight must be like if he is to be called “influential.”<sup>[3] 133</sup>

韦利将“士”直译为“knight”。“knight”在朗文词典<sup>[5] 838</sup>中的解释为“a man with a high rank in the past who was trained to fight while riding a horse or a man who has received a knighthood and has the title ‘sir’ before his name”，即“骑士、爵士”。而李和杨注解为“读书人、知识分子”。韦利的直译与其翻译观有很大的关系，他认为在翻译时，应根据原文的结构逐字逐句直译，而不是意译，这种翻译方法尤其适用于中国古诗的翻译；他还认为诗的意象是诗人的灵魂，译者不可加入自己的想象更改原诗，意译很可能歪曲诗的愿意或者致使一部分信息流失<sup>[2] 19</sup>。韦利将“士”理解为骑士，这与他的知识背景、空间环境有很大关系，但是《论语》成书于春秋战国，所用语言简约而又意义深远。“士”本意为知识分子和读书人这一社会阶层，中国文化中也不存在骑士这种身份，因此韦利的理解与《论语》本身的意图产生了偏差，没有把

握好整句话的语境,从而影响了交际效果。

交际是语用学的本质,要想达到交际效果,必须考虑说话人的意图和听话人的解释以及语境,必须讲究语用策略。由于不同时代背景、认知结构和语言习惯以及自己持有的翻译观,韦利对《论语》的理解在翻译某些词语时没有把握住《论语》言语的意图忽略了语境,造成目的语读者理解障碍。

### 3.2 文化误译

Nord<sup>[1]</sup>认为,文化误译是由于对文化特性和文化习俗的认识不充分,对其复制或适应所采取的策略不准确造成的。“译者的语言应用折射出了译者既有的文化先结构,译者的文化先结构又从某种意义上制约了译者在语言应用上的主观能动性”<sup>[15] 44</sup>。韦利本身语言中的文化先结构对典籍《论语》翻译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有很大影响,而这种影响又是负面消极的,如:

例3:……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子路·20》)

李译:子贡说:“今天那些搞政治的人怎么样?”孔子说:“咳!这班度量狭小、见识短浅的人,算得上什么?”<sup>[9] 393</sup>

杨译:子贡到:“现在的执政诸公怎么样?”孔子道:“咳!这班器识狭小的人算得什么?”<sup>[14] 157</sup>

韦译:Zigong said, “What would you say of those who are now conducting the government?” The Master said, “Ugh! A set of peck-measures, not worth taking into account.”<sup>[3] 149</sup>

杨注释:斗筭之人——斗是古代的量名,筭为古代的饭筐,能容五升<sup>[14] 157</sup>。斗筭譬如度量 and 见识的狭小。《古代汉语辞典》<sup>[8] 332-1376</sup>中也注释:“斗”与“筭”都是容量不大的量器,因用以比喻才器量小。韦利显然了解到“斗”和“筭”是计量单位,可是受到其文化先结构的影响,他并没有深究词语深层的文化意义,因此将“斗筭之人”译作“peck - measures”。这样的直译忽略了文字背后的文化内涵,必然会使使译入语读者对原作内容的理解产生偏差。再如:

例4: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卫灵公·11》)

李译:颜回问如何建立国家制度?孔子说:“用夏朝的历法,坐商朝的车子,戴周朝的礼貌,采用舜的音乐,舍弃郑国的曲调……”<sup>[9] 454</sup>

杨译:颜渊问怎么去治理国家。孔子道:“用夏朝的历法,坐殷朝的车子,戴周朝的礼貌,音乐就用《韶》和《武》。……”<sup>[14] 184</sup>

韦译:Yan Hui asked about the making of a State. The Master said, “One would go by the seasons of Xia, as State-coach for the ruler one would use that of Yin, and as head-gear f ceremony wear the Zhou hat.”<sup>[3] 175</sup>

韦利对“the seasons of Xia”进行了注释:It was believed that in the Xia dynasty the year began in the spring. 杨伯骏<sup>[14] 185</sup>也有详细的注解:行夏之时——据古史记载,夏朝用的自

然历,以建寅之月(旧历正月)为每年的第一月,春、夏、秋、冬合乎自然现象。周朝则以建子之月(旧历十一月)为每年的第一月,而且以冬至日为元日。这个虽然在观测天象方面比较进步,但使用起来却不及夏历方便与农业生产,就是在周朝,也有很多国家是仍旧用夏朝历法。从韦利的英文翻译来看,他对“夏历”这一带有浓厚文化色彩的词语理解并不透彻。

译者的地域环境、社会背景、历史背景、生活习俗以及传统习惯等都归属于文化先结构,这些因素,它们互相交织相互作用影响了译者对异域文化的理解和阐释。因此,译者的文化先结构制约着译者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如果译者的文化先结构与原语文化先结构相接近,译者很容易理解原语文化并进行解释和传播;反之亦然。译者通常也会按照原语和目的语文化需要,去确定译本的翻译文化,进而相应的确定其翻译内容和翻译策略。韦利受自身所处的时代文化、自身的知识结构以及两种语言不同的特点和隐藏在语言背后的不同的文化的影响,对原语文化的理解难免会出现与原作不同的地方,从而造成一定程度上文化层面的误译。因此,作为译者就要身体力行地去沟通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让译者本身的文化先结构最大可能接近译语文化结构。

### 3.3 语言误译

Nord<sup>[1]</sup>认为语言误译是由于对字词和语言结构理解不充分而导致的误译,韦利英译《论语》中也大量存在着类似的误译现象,如:

例5:子曰:“刚、毅、木、讷近仁。”(《子路·27》)

李译:孔子说:“刚强,坚韧,朴实,寡言,接近于仁了。”<sup>[9] 401</sup>

杨译:孔子说:“刚强、果决、朴质,而言语不轻易出口,有这四种品德的人近于仁德。”<sup>[14] 161</sup>

韦译:The Master said, “Imperturbable, resolute, treelike, slow to speak—such a one is near to Goodness.”<sup>[3] 151</sup>

中国古汉语语言简练,意义隽永,一个字或词常常具有许多意义项,并兼属许多词类。例1中,“木”是朴质朴素之意,并非韦利所译“treelike”(像树一般),这样的翻译与原句称赞仁德的特点相差甚远,并不属于同一性质,显然会给目的语读者带来理解障碍或者误解,单纯的将“木”理解为其字面意思,是由于没有探究深层涵义所造成的。这样的误译是由于深受背景文化影响的译者受不同语言习惯的影响而造成的,再加上译者自身对汉语的认知存有误差,语言文字层面的误译,会不可避免地存在于翻译之中。再如:

例6:子路问事君:“勿欺也,而犯之。”(《宪问·22》)

李译:子路问如何事奉国君,孔子说:“不要欺骗他,可以触犯他。”<sup>[9] 424</sup>

杨译:子路问怎么服侍人君。孔子道:“不要[阳奉阴违地]欺骗他,却可以[当面]触犯他。”<sup>[14] 173</sup>

韦译:Zilu asked him how to serve a prince. The Master said, “Never oppose him by subterfuges.”<sup>[3] 161</sup>

古文中,句子成分省略或者是用一个简单的代词来指代句子成份的情况是很常见的,因此,在翻译的时候要结合上下文来看,才能了解句子中所省略掉的成份到底是什么,或者某一代词所指代的成份是什么。如果不能把这些问题搞清楚,那么译文就会背弃原文的意思。在这个例句中,孔子指出侍奉君主,不能欺骗,但当君主犯错时,要敢于进谏,哪怕触犯君主。韦利对“欺”和“犯”的理解同属一种性质,都是对君主的不敬,因此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将两句合并为一句,只将“欺骗”和“反对君王”之意译出,却没有考虑到原句中前后两句之间的转折关系。若如韦利所认为,在侍奉君主的时候,仅仅不能哄骗欺瞒,而不直言进谏的话,就不能算作称职的臣子,这有悖孔子的儒家思想要义。

不同语言中的字词有着属于自己语言系统和文化系统的外延和内涵,如果译者不能充分理解字词的外延和内涵,就会出现理解上的偏差。同样,不同语言习惯的差异会导致译者在表达原语意思时出现生搬硬套的现象。虽然韦利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但自身的语言特点、习惯和思维模式对他翻译中国典籍时有很大影响,出现误译在所难免。

#### 4、影响译者主体性的其它因素

译者主体性贯穿于翻译活动的整个过程,译者主体性不只体现在对原作的理解阐释、翻译策略的选择上,也体现在译者对原作及其今注版本的选择上。不同原作文本、今注文本的不同,会导致一定的误译。如:

例7: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宪问·29》)

李译:子贡长讥评人物。孔子说:“子贡,你就那么好吗?我却都没有这闲工夫。”<sup>[9] 430</sup>

杨译:子贡讥评别人。孔子对他道:“你就够好了吗?我却都没有这闲工夫。”<sup>[14] 175</sup>

韦译:Zigong was always criticizing other people. The Master said, “It is fortunate for Ci that he is so perfect himself as to have time to spare for this. I myself have none.”<sup>[3] 163</sup>

此处韦利将“赐”理解为人名,并将反问换成了平铺直叙。与李和杨的理解存有差异,却与王云五在《论语今注今译》<sup>[11] 231</sup>的注释“子贡批评别人的不对”不谋而合,都将“赐”理解为另一个人。

例8: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尧曰·1》)

李译:说:“我小子履谨用黑牛公开禀告光明伟大的上帝……”<sup>[9] 564</sup>

杨译:……[汤]说:“我履谨用黑色牧牛作牺牲……”<sup>[14] 234</sup>

韦译:… (Tang) Said, “I, your little son Lü, venture to sacrifice a black ox……”<sup>[3] 229</sup>

杨在文后注释:“予小子”和“予一人”都是上古帝王自称之词<sup>[14] 234</sup>。李解释为“我小子”,由此看来,不同译注文本的选择会产生不同的译文。

译者的翻译目的、文化先结构以及客观因素(如赞助

商、出版社)影响了翻译内容和原本注释本的选择。不同的注释本有着不同的解释,这为译者翻译出好的译本以达到文化交流和传播目的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通过以上实例分析,我们发现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显示出重要地位,“理解不是被动的去复制文本,而是一种创造性活动。这就道出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价值,译者主体性的介入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不可避免的”<sup>[10] 11</sup>。由于理解的历史性和局限性,译者的理解与原作者的理解难免会有误差和偏见,而这种误差和偏见也是译者主体性的表现,体现了译者的能动性和受动性;也正是这种误差和偏见,才使得原文本的审美价值、意义内涵不断被呈现和挖掘。

从上面几点分析可以看出,本文中涉及的三种误译:语用误译、文化误译和语言误译没有明确的界限,它们还有相互重合的部分。依笔者来看,三种误译中文化误译最为重要,次之语用误译,语言误译可以放最后。只有弥补了文化方面的隔阂,语用和语言方面的差距弥补自然不存在太大困难。文化问题涉及到两种语言中不同的文化,翻译的最终目的是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所以解决好文化问题首当其冲;其次,要想获得较好的交际效果以达到文化交流,就必须了解说话人的意图和语境,所以翻译中语言问题也成了顺利进行文化传播的决定性因素。不管是再现文化还是要再现说话人的意图,都必须以语言为主要形式,并且发生于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下,所以这三者环环相扣,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从译者主体性角度看这三种误译,我们看到在处理这些误译时,译者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去理解说话人的意图,把握整个语境;译者不仅应保留自己的文化体质,还应积极主动地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在介绍外国文化的同时推动本国文化;译者不仅要传达原作内容的基本信息,而且还要传达原作的审美意蕴。越是有些的文学作品,其审美信息、文化意蕴就越就丰富,翻译的难度就越大,这就更需要发挥译者的创造性<sup>[6] 22</sup>,但不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忽视翻译目的,为了达到特定的翻译效果,实现译文的交际目的,让目的语读者了解原作内容思想,译者不得不全面考虑,从而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和文化维度对译文进行处理,因此,译者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并不是无限制的,它会受到客观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正如陈大亮<sup>[7] 4</sup>所说:“主体性说到底还是能动性和受动性的辩证统一”。综合上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捕捉原作者的意图、了解原语文化,还要考虑到翻译动机和目的以及目的语读者的接受水平和时代背景,以最大程度上避免误译。

#### 5、结语

本文通过分析译者主体性在韦利《论语》英译本的误译中的体现,得出在翻译过程中,我们既不能忽视译者的作用也不能一味张扬作为中心主体的译者的作用。首先,译者不能单一地取归化而抹去原文中蕴涵的异国情调和

(下转第73页)

更合理,还应考虑哪种理论更可接受或哪种道德要求更适应和更有利于现代社会的良性发展。

在此意义上,我们对德性的构建或应重新回归现实生活。归根究底而言,德性是源于生活的,而非人类的理性和意志。在古代,德性被看做一种习俗,它是与生活内在关联的。德性对自我的构建来自于人生存于其中的生活本身,在生活实践中获取认同感,由生活实践把“人之所是”构造成“人之应是”。但是现代性企图用理性来构建德性,造成了德性与生活的分离,从一开始就在德性与人之本真状态之间制造了一种紧张。“道德危机的出现,主要不是因为理性无力创造人间的正义,而是因为历史的良心一旦完全意识到自己,理性便丧失其客观性。”为此,现代对道德体系的建构在探索应重新审视德性本身内在的必然性,把目光转向现实生活,在德性与生活、生命的关联中寻找出路,在现实生活复杂的领域分野中寻找融合和统一的现实中介。

向现代性过渡既是理论上的又是实践上的,在此过程中产生的德性危机也就不仅仅是一场学理上的危机,它更是一场现实的危机。所以即使在学术上造成了政治和哲学的分离,但是现实历史中并不存在一部政治的历史和一部哲学的历史这样的分化。故对德性的重构并不能局限在伦理学的领域进行,而应跨域到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法学等领域以及现实的政治社会中进行对话和探讨。通过这样的延伸,或许才能在现代工具理性、功

利价值、和德性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对德性的价值的再确立以及现代道德体系建构提供另一种思路。

#### 【参考文献】

- [1]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科伦理学 [M]. 苗力田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 [2] [美] 麦金泰尔. 追寻美德 [M]. 宋继杰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8.
- [3] [美] 罗尔斯. 道德哲学史讲义 [M]. 张国清译. 上海: 三联书店, 2003.
- [4] 徐向东. 自我、他人与道德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 [5] 刘小枫, 陈少明. 美德可教吗 [C].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6.
- [6] 陈少明, 等. 被解释的传统 [M].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5.
- [7] 高国希. 德性的结构 [J]. 道德与文明, 2008, (3).
- [8] 陈泽环. 多元视角中的德性伦理学 [J]. 道德与文明, 2008, (3).
- [9] 陈庆超. 德性的式微与回归 [J]. 道德与文明, 2008, (2).
- [10] 郑明哲. 贫乏的道德性——现代性道德的症结与出路 [J]. 浙江学刊, 2009, (5).

(上接第 51 页)

文化因素,也不能一味异化而忽视目的语读者的接受水平,而应积极主动地了解异域文化,把握异域文化特质,让译者本身的文化先结构最大程度地接近译入语文化结构,同时要把握原语文化的厚重性,以传播文化为己任;其次,译者在克服文化障碍的基础上,就需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了解原作者意图,感受语境,真正做到译文能恰如其分地在目的语语境中获得应有的语用效果;最后,译者需要努力克服语言本身带来的障碍,避免因为语言这些最基本的因素而给文化传播带来障碍;总之,译者应以翻译目的为指导方向,以目的语读者的接受水平为基准,相应的选择合适的翻译内容、文化尺度以及翻译策略,最大程度上避免误译,更好地再现原文。

#### 【注释】

- [1] Nord, C.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 Approaches Explained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 [2] Waley, Arthur. One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 [M]. London: Constable and Co Limited, 1928.
- [3] Waley, Arthur. The Analects [M]. 长沙: 湖南人

民出版社, 1999.

- [4] Waley, Arthur.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M]. New York: Quality Paperback Book Club, 1992.
- [5] 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 [Z].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8.
- [6] 查明建, 田雨. 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 [J]. 中国翻译, 2003, 24 (1).
- [7] 陈大亮. 谁是翻译主体 [J]. 中国翻译, 2004, (2).
- [8] 古汉语辞典 [Z].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 [9] 李泽厚. 论语今读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 [10] 屠国元, 朱献珑. 译者主体性: 阐释学的阐释 [J]. 中国翻译, 2003, 24 (6).
- [11] 王云五. 论语今注今译 [M]. 台湾: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8.
- [12] 徐珺. 汉文化经典误读误译现象解析: 以威利《论语》译本为例 [J]. 外国语, 2010, 33 (6).
- [13] 许钧. 文化“差异”与翻译 [J]. 中国比较文学, 1997, (1).
- [14] 杨伯峻. 论语译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15] 仲韦合, 周静. 译者的极限与底线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6, (7).